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

人文论丛

张英洪 戚祖良 著



中国

农民与当代政治

ZHONGGUO NONGMIN YU
DANGDAI ZHENGZHI

中国文史出版社

当代中国农村发展报告 2006
中国农村发展报告



中国 农民与当代政治

中国农村发展报告 2006
中国农村发展报告

中国农村发展报告

中国农民与当代政治

张英洪 戚祖良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农民与当代政治/张英洪,戚祖良著.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8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第7辑/陈星主编)

ISBN 7-5034-1638-6

I. 中… II. ①张… ②戚… III. 农民—问题—研究—中国 IV. D42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0622 号

中国农民与当代政治

责任编辑:李春华 封面设计:福瑞来书装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100811

印 刷: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邮编:101109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7.75

字 数:215 千字

印 数:1000 册

版 次:2005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全套定价:400.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总序

张立文

近代以来,西学潮水般地涌进,激烈冲击着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为适应于世界学术文化的发展,中国知识精英们纷纷吸纳西学。这种中西学术文化的交往和碰撞,是促使学术文化转型和发展的动力。罗素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①中西学术文化的交流,使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向现代转变。

中国学术文化在学习、接纳、引进西学的过程中,按西学的学科分门别类,以现在话语说便是与世界学术文化接轨。接轨意蕴着痛苦的冲突和融合:一是要转变传统学术文化的思维方式、立场观点、价值观念、评价标准,以适应西学的需要;二是要肢解传统学术文化的有机整体,选出符合于西学学科名之者的资料而叙述之,不符合于西学学科名之者的资料则抛弃之;三是变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主体的自我发展演化为被动的、受制于人的发展演化;四是要放弃一些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学科范式和学术规范,照着西方学科范式和学术规范讲。在中西学术文化的交流中,有得必有失,有收获也必有牺牲,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但如何得多失少,收多损少,这便大有讲究。主张学术文化“全盘西化”者,“一边倒”学苏联者,则得少失多;学术文化保守主义者、国粹主义者,则失少得少,两者在得少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① 罗素:《中西文明比较》,胡品清译,《一个自由人的崇拜》,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

在中西学术文化交流中,如何得多失少?应选择融突而和合转生的方式。印度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学术文化,在汉代传入中国后,便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生冲突,展开了“沙门敬不敬王”、“神灭不灭”、“因果有无报应”、以及“空有”、“夷夏”、“化胡”等辩论。到唐韩愈主张对佛教文化采取“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①的简单拒斥方法,而柳宗元主张“统合儒释”,出入佛道。柳氏在回答韩愈指责他为什么不斥佛时说:“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吾之所取者,与《易》、《论语》合,虽圣人复生,不可得而斥也。”^②柳宗元在当时对待儒、释、道三教的态度:一是以平等、同情的立场和视角看待三教,不扬此薄彼,或尊彼卑此;二是出入儒、释、道三教,才能深入各家学术思想的堂奥,既悉其本真,又知其长短;三是在出入儒、释、道之中,明三教冲突之所在,才能悉三教融合的关键。在这里冲突也是一种融合的方式,所以不能排斥冲突,而应融合冲突;四是吾所取于佛、道者,与《易》、《论语》合。换言之,柳宗元是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出发,以《易》、《论语》为“取”的标准,不是以佛、道为“取”的标准,即取佛、道以合于《易》、《论语》,而不是相反,从而在“统合儒释”中发展中国学术文化。

韩、柳两人对待外来学术文化与本土传统学术文化的立场、态度及其“取”法,对后世宋明学术文化影响巨大。宋初一派以“夷夏”、“费财”之辩拒斥佛教;另一派出入佛道,无论是张载、二程,还是朱熹、陆九渊、王守仁,都累年尽究佛、老之说,而后反求诸《六经》,终于在儒、释、道三教融突中和合转生为新儒学,即宋明理学。学术发展的历史说明,粗暴的批判,取缔的暴力,激烈的拒斥,并不能消除一种思想、学说、理念对于人的思维、心灵的渗透和影响。韩愈主张对佛教采取强制僧侣还俗,焚毁经卷,没收庙产的做法,并没有阻止佛教的继续传播和发展。在唐代,绝大部分第一流知识精英与佛、道有很好的交往,以至相

① 韩愈:《原道》,《韩昌黎集》卷Ⅱ,《国学基本丛书》本。

② 柳宗元:《送僧浩初序》,《柳宗元集》卷25,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73~674页。

信佛、道,出现了一批伟大的宗教家,而没有造就伟大的儒学哲学家。伟大的儒学哲学家应该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统合儒、释、道三教之学者,宋明理学家沿着融合儒、释、道三教道路,出入佛老,反诸《四书》,和合转生,而开出理学的新学风、新思维、新理论。

在当今中、西、马学术文化交流互动的情境下,学术界在改革开放以后清算了极左思潮,开创了学术的春天,营造了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提倡说理充分的批评与反批评,鼓励大胆探索,主张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既不要把学术探讨中出现的问题当作政治问题,也不要把政治倾向性问题当作一般学术问题,明确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为学术研究和讨论松了绑。在这种学术的氛围中,中、西、马学术文化的冲突、融合,而喷发出智慧之光,中华学术文化在吸纳西、马学术文化中,和合转生为新的学术文化;西、马学术文化在中国化过程中,成为中国化的西、马学术文化。中、西、马学术文化融突和合,生生不息。

无论是中华学术文化的和合转生,还是西、马学术文化的中国化,都应从创新出发,立足于创新,落实于创新,创新是学术文化发展的硬道理。我们“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我们要“立足当代又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立足本国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我们要“努力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积极推动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这里所说的“三个解放”,就为中华学术文化的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的“三个创新”,营造了前所未有的创新机遇和优越氛围。我们应该有下地狱的精神和盗天火的勇气来实现中华学术的这“三个创新”,建构中华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便是从这“三个创新”契入,回应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种种冲突和危机。他们各自从教育学、中西哲学、文学、历史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心理学、逻辑学、新闻学、语言

学、科学等多视角、多层面探索问题。并以强烈的问题意识,接触各种学术文化中的深层问题,提出种种化解之道。既有对中华民族学术文化的继承和新诠释,又有对西方学术文化的吸收和新诠释。在融突“古今中西”学术文化中,尊重知识,尊重人品,尊重人才,尊重创新,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那末实现“三个创新”的目标一定能够达到。

是为序。

2004.4.6

于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

序：从政治上重新认识农民

从政治上审视当代中国农民问题是我们涉足三农问题研究的主要旨趣所在。长期以来，三农问题研究的主流是从经济学和社会学入手，就事论事地在诸如减轻农民负担和增加农民收入上进行封闭研究。世纪之交，对三农问题的研究出现了新的历史性转机，一些触及深层次问题的著作和论文先后问世，这包括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于建嵘的《岳村政治》及其重要论文《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陈桂棣夫妇的《中国农民调查》等。张英洪的《给农民以宪法关怀》出版后在读者中尤其在农民朋友中产生了较大反响，这也促使我们将此书尽快整理出版。

这本书定名为《中国农民与当代政治》，是我们“三思”的结果。我们的意思是，中国农民问题与当代政治密切相关。遗憾的是我们还没有对此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本书汇集的文章只是对这一问题的“点题”，真正的“破题”和“结项”有待于今后的持续努力。

请人作序是一件颇费心神的差事。我们既怕打扰他人，又怕请作的序不甚合意。在一段时期的沉思中，我们发现于建嵘先生发表在《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三期上的经典论文《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的第三部分完全说出了笔者从政治上关注农民问题的心声，现抄录如下：

农民有组织的抗争的发生和持续、农民利益集团意识和权利意识的增长，以及农民政治诉求的提高，是我国农村特别是中部地区客观存在的政治现实。它一方面揭露了现行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向执政者和关注农民的学者提出了一个挑战，那就是必须在政治上重新认识农民。长期以来，政界和学界都存在许多关于农民政治意识

权利意识、组织能力的成见。这些成见的共同特点是有意无意地贬低农民。我曾经在北京大学的一次公开演讲中说过,在许多具有社会良知的知识精英提出的三农问题解决方案里,我们看不到农民自己的力量,农民没有被放在农村社会发展的主导地位。事实已经证明,当代中国的农民完全不同于马克思笔下的法国农民,不同于恰亚诺夫和菲尔德笔下的俄国农民,不同于斯科特笔下的马来西亚农民,不同于波普金笔下的越南农民,不同于沃尔夫笔下的墨西哥农民;他们 also 不同于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心目中的农民。对于学者来讲,为了真正了解现代中国的农民,必须勇敢地克服政治禁忌和自我审查,放下预设的理论框架和概念模式,以学生的身份而不是以学问家的身份深入农民的生活,进入最能全面实际地观察农民真实政治心态和行为的现场,争取他们的信任,了解他们真实的政治观念和行动方式。

执政者同样面对一个如何在政治上重新认识农民的问题。我认为,农民问题不出在农民,而出在执政者。执政者必须尊重农民,更重要的是必须相信农民。执政者的自信、执政者对农民的信任、农民对执政者的信任三者互为因果,同消同长,但是执政者在这个互动中具有主动地位。回顾建国以来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每当党和政府自信并相信广大农民时,农民不仅对党和政府报以高度的政治信任,更能在发展经济、社会、文化的各项事业中发挥出巨大的创造力和主动进取精神。每当中央出于各种原因试图把农民的思想、行为和财富管起来,就势必为基层政府及干部打开滥用权力乃至鱼肉农民的方便之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以绝大的勇气,一改过去试图改造农民的思路 and 做法,转而承认和尊重农民作为经济人的权利,把经济活动这只老虎放出了囚笼。二十多年的实践证明,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完全能够驾驭市场经济这只猛虎。在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趋成熟,承认并尊重农民作为政治人的权利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要求。稳健有序地扩大和完善政治参与的制度渠道,有效积极地容纳中国农民日益增强的公民权利意识,重构我国的政治体制使之适应迅速发展变化的经济现实和社会现实,是摆在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

人面前的艰巨挑战，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中国人民的历史性机遇。我们绝对不可低估这个挑战的艰巨性，但我们过去二十多年的改革经验也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最后胜利满怀信心。

实事求是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为了保持农村的长期稳定和发展，必须不断调整和改革农村政治体制。要做好这项工作，执政者的当务之急是调整和摆正国家与农民的政治关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归根结底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更加具体地将人民的利益放在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执政者的执政地位，从来不能建立在自恋自夸的基础上，否则就只能用赤裸裸的暴力来维系，最终也必然被无情的革命暴力所摧毁。现代社会的政治合法性，应该来自人民自觉自愿的认同和支持。代表资格从来不是自封的，否则历史上的所有暴君都可以堂而皇之地说自己是臣民的代表；赢得人民的资格认定也从来不是一劳永逸的，否则就无法解释菲律宾的马科斯为什么被他从前的选民无情地抛弃。因此，我们必须强调，要代表人民的利益，服务人民的利益，首先必须真正承认人民的主人翁地位。作为人民的公仆，执政者必须倾听人民自己的呼声，让人民自己讲话，让农民自己讲话。农民事实上一直在讲话，他们讲得比自觉为农民利益说话的知识分子讲得更精彩、更深刻。党和政府要想听到农民真正的心声，必须有充分的自信，必须相信农民，更必须争取农民的信任。我认为，党和政府没有理由不相信农民，更没有理由害怕和防范农民。党和政府必须严加防范的是那些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封锁农民心声、镇压农民民意领袖、为追求个人升迁不惜牺牲国家和人民长远利益的地方党政领导；是那些推诿责任、不关心农民疾苦、麻木不仁的官僚；是那些避重就轻、粉饰太平、无视农民抗争，甚至以阴谋论解释农民抗争、为一己私利不惜误国误民的所谓农民政治研究者。根据这些年在农村的所见所闻，我形成了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半个多世纪的共产党领导使广大农民对党中央有坚定的信任，多年的革命宣传已经使人民当家作主的公民权利观念深入人心，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给了农民一定的经济自主权，文化教育的发展使农民有了作出独立政治判断的能力，现代化的

通信和宣传为农民提供了获取党中央政策信息的渠道,这一切都决定了党和国家不可能再以命令主义的方式管理农民。与时俱进是中国共产党长盛不衰的生命线,在政治上重新认识农民、信任农民、承认和尊重农民作为政治人的公民权利、与广大农民开展协商对话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当今中文文献中,能找到上面这一段甚合我们心意的文字,实是难得。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出现了重大转机。多年来,我们与许多学者共同呼吁取消农业税的政策建议终于变成了中央的决策。全部免征农业税,彻底改变了两千多年来农民种田缴纳“皇粮国税”的历史。这使我们有信心期待在农村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和建立包括农民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等一系列尊重、保障和实现农民权利的政策制度早日到来。

作者

2005年3月25日

目 录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破除二元社会结构	(1)
促进农民自由而全面发展	(12)
农民自由发展与乡镇体制改革	(31)
村民自治的路径依赖	(47)
女性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与社会保障	(52)
乡镇干部的角色错位与转换	(58)
实施城镇化战略	(65)
户籍改革:湖南你要争上游	(73)
宪法照耀中国	(81)
新世纪呼唤政治学家	(92)
政治体制改革与十六大的主题选择	(99)
依法治国方略中的党的领导	(110)
邓小平关于党政关系的思想	(120)
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思想	(130)
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	(133)
劳教制度:是改还是废?	(138)
中国人大制度创新	(147)
当代中国农民的政治权利	(160)
当代中国农民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	(177)
李昌平为什么成功?	(191)
构建农民增收的制度环境	(196)
降低社会转型的痛苦指数	(199)

新旧体制交织下的农民工

——与“草根学者”张英洪对话 汤潇 (202)

张英洪:给农民以宪法关怀 章涌 (212)

从“宪法关怀”说起

——青年学者张英洪印象 向继东 (221)

代后记:学术界的五大积弊 (225)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破除二元社会结构^①

三农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突出问题。我国三农问题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我们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建国后人为形成的二元社会结构。统筹城乡发展,彻底破除二元社会结构,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二元社会结构

美国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通过对印度、埃及等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后于1954年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1954年、1955年刘易斯先后发表《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理论》两本著作,确立了发展经济学的第一个模型。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典型特征是二元经济结构。我们认为这种二元经济结构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源于城乡不同的资源特征而自然形成的。从世界经济的发展历程来看,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和集中,城乡之间不同的发展水平导致普遍的城乡差距。这种城乡差距的自然特性,有其不可避免性,这是一种发展中的正常差别。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城乡差距会不断缩小。虽然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城乡发展差距,但与中国这种人为的制度因素造成的城乡差距有着明显的不同。

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农民大国,城乡之间的差别历来存在。问题是,我国城乡之间的差距不只是体现了发展中国家普遍

① 本节合作者周作翰。

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更关键的在于,建国后通过一系列城乡分割的制度安排而形成的人为的二元社会结构。二元社会结构是当代中国不同于任何发展中国家的显著特征,是有中国特色的三农问题的要害和根源。

所谓二元社会结构,是指我国建国后通过一系列分割城乡、歧视农民的制度安排而人为构建的城乡隔离的社会结构。在一个主权统一的国家内,人为地把全体公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形成农民和市民社会地位完全不同的制度体系,这在当今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二元社会结构的概念是农业部原政策研究中心农村工业化城市化课题组于1988年最早提出并详细论述的。^①通过对三农问题的持续关注,我们认为人为制造的二元社会结构是中国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

二元社会结构人为地控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自由流动。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一个国家和地区要想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就必须使人口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在今天,放眼世界各国,人口在城乡之间的流动莫不是自由进行的。但我国建国以后,囿于严重的思维局限和特殊的社会环境,空前出台了以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为主要目标的户籍制度,人为隔离城乡,使市民和农民身份凝固化,这种举世罕见的城乡隔离制度,形成了城市和农村两个各自封闭循环的体系、市民和农民两种身份迥异的不同公民。改革开放以来进城务工的农民也无法获得名正言顺的市民身份和工人地位,他们只能被称之为不伦不类的“农民工”。

二元社会结构人为地遏制了城市化进程。城市化本来是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同步发展的。20世纪中期以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水平突飞猛进,而同期的中国却通过人为地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导致城市化几乎踏步不前。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一般城市化率均高于工业化

^① 课题组:《二元社会结构:城乡关系:工业化·城市化》,载《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8年第90期。

率。历史的经验表明,低收入国家高出2个百分点,中下等收入国家高出21个百分点,高收入国家如美国1970年高出50个百分点,而中国1978年的城市化水平却低于工业化水平31.5个百分点。^①人为的二元社会结构使我国城市化水平既明显滞后于国内工业化水平,又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

二元社会结构人为地剥夺了农民创造的巨额财富。农业本是弱质产业,综观世界各国政府大都实行特殊的农业保护和支持政策。而我国建国后却实行“挖农补工”政策,通过人为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形式从农村大量吸取农民创造的巨额财富来满足工业化优先发展战略所需的原始积累资金。从1953年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到1985年取消粮食统购,农民对工业化的贡献大约是6000亿~8000亿元。农民千辛万苦创造的财富就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地被国家以剪刀差形式不断挖走以支持工业和城市。同时,国家又通过农业税收和其他税费从农村吸取超过农民承受能力的巨额资金。1995~2000年,农民年均缴纳农业税金254亿元,1999年农民缴纳农业特产税88.9亿元,缴纳屠宰税、耕地占有税、农村个体承担工商税1449.8亿元;1998年农民缴纳提留统筹费729.7亿元。^②加上其他乱收费和摊派,农民苦不堪言。农民财富的被超额剥夺和税费负担的居高不下,既造成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使几千万农民活活饿死的大饥荒,又引发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农民负担日益沉重为主要特征的三农问题。

二元社会结构人为地限制了宪法赋予农民的基本权利。农民问题的本质在于农民在二元社会结构中基本权利的缺失。这种权利的缺失使农民这一弱势群体的社会地位更加弱势化。比如,现行的户籍制度限制和剥夺了农民的居住和迁徙自由权;收容遣送制度剥夺了农民的人身自由权;就业制度使农民既不能在党政机关求职,也不能在国有企业工作,大量在非国有企业谋职的进城农民却连工人的身份都没有得

① 转引自何家栋、喻希来:《城乡二元社会是怎样形成的?》,载《书屋》,2003年第5期。

② 方言:《我国农村税费现状及成因分析》,载《经济研究参考》,2001年第24期。